臺大歷史學報第36期
2005年12月，頁357~406

BIBLID1012-8514(2005)36p.357-406
2005.8.10收稿，2005.11.24通過刊登

# 以撒．柏林的史論
## ——從觀念史的思考到決定論的批判

林　慈　淑*

## 提　要

本文專究柏林的歷史思想，探討柏林在一九五〇年代時，對「觀念史」這個領域的思考和期許，以及對西方近代史學和文化思潮的一些評述。本文更宏觀的企圖是藉由柏林，條理出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史學和文化發展的一二軌跡。

探究柏林的思想之路，首先照見的是觀念史研究在英國歷史學界中的困境。柏林認定觀念史處理的是過去之人的獨特意識經驗和結晶，正呈現他循著勒弗喬（A. O. Lovejoy）這派「觀念史」的腳步而來。他持著多元主義的原則，不認同十九世紀史學的變革具有進步意義，和當時許多史家的看法悖反而行。他質疑非個人解釋的力量日漸膨脹，惋惜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和責任受到漠視和壓抑，是對二十世紀以來社會科學以及社會史興起的擷頏。而在一九五〇年代批判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形上哲學風尚中，柏林更以決定論之名強力回應此時代風潮。

關鍵詞：以撒．柏林　觀念史　史學　決定論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二、柏林從哲學到觀念史之路
三、柏林論觀念史研究的價值與方法
四、柏林論近代史學變革的意義
五、柏林批判「決定論」
六、結語

# 一、前言

有關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這位二十世紀著名的思想家，學界論及他的學術貢獻時，多半想到的是他的政治哲學，[1]而他的自由主義論說，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傳統中，的確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柏林著名的《自由四論》（*Four Essays on Liberty*）於一九八六年時，已有中譯本在臺發行。[2]

1 有關柏林的政治思想和自由主義的研究，可以參見格雷（John Gray）所列書目和介紹：John Gray, *Isaiah Berli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2-183. 另外，伊安．哈理斯（Ian Harris）也曾就柏林的著作和他人探究成果提供了詳實而中肯的介紹和評述，頗值參考：Ian Harris, “Berlin and his Critics,” in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49-265. 伊安．哈理斯，〈柏林及其批評者〉，收在以撒．柏林著，胡傳勝譯，《自由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397~417。不單國外學界傾向於討論柏林的自由主義，國內研究柏林的趨向亦然。目前所見討論柏林之作，幾乎都出自政治學者之手，討論的主題多半環繞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議題。如李振坤，〈柏林自由理論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余桂霖，〈伊賽．柏林的政治學與理論〉，《復興崗學報》50（1993，臺北），153~180；程春益，〈以撒．柏林著「兩種自由概念」介述〉，《萬國法律》74（1994，臺北），12~16；蘇文流，〈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政治學報》13（1985，臺北），287~323。

2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柏林論著的中譯另有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彭淮棟譯，《現實意識》（臺北：臉譜出版社，2004）；馮克利譯，《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胡傳勝譯，《自由論》。

其實翻閱柏林的論著，不難發現，這位思想巨擘畢生從事更多的是屬於「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領域的研究。一九四〇年代，柏林的寫作主要針對俄國思想，一九五〇年代後，他逐漸轉向十八、十九世紀啟蒙和浪漫運動的鑽研探討。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一九五〇年代多篇文章，如〈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Political Idea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歷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現實意識〉（"A Sense of Reality"）中，暢談歷史學科的研究特質和方法。柏林也曾在一九六五年時，不無自嘲地說道：「自己更像一個歷史學家，教席卻是以政治哲學理論為重心。」[3]也就是說，柏林當時心目中自認為是歷史學家更甚於政治學家，顯見他在歷史領域——包括觀念史研究和歷史思想方面，確曾費心經營。

柏林以政治哲學稱譽學界，但他的史學思想較少獲得青睞。究其原因，一個可能是柏林思想博雜旁通，各方面都有涉獵，歷史只是其中一部分，自然分散了世人對他這方面觀念的注意，或者根本就將其史學思想劃歸入他的政治哲學之內，雖然柏林的史觀的確與其政治理念密切相關。此外，柏林的歷史著作主要環繞近代西方觀念的沿革發展，但這一領域的研究始終難獲英國哲學和歷史學界普遍的認同。再者，英國著名史家愛德華．卡耳（E. H. Carr, 1892~1982）可能也要為柏林史學思想長久以來的黯淡命運負上些責任。卡耳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且盛名歷久不衰的《歷史論集》（*What is History?*）中，不但嘲笑一班包括柏林在內的「通俗」（common sense）歷史學家，並認為柏林所抱持的是過時的自由主義式史觀，[4]而柏林「將個人天才視為歷史的創造力」這一看法也被卡耳鄙為初民時代的產物，放在今天的社會中來看顯得幼稚而不成熟。[5]卡耳這些嚴厲的批評對於英國讀者應有一定的影響力，對於柏林史學思想的

3 邁克．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著，高毅、高煜譯，《他鄉：以撒．柏林傳》（臺北：立緒文化，2001），398；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London: Vintage, 2000), 261.

4 愛德華．卡耳（E. H. Carr）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1968〕），27~28；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61), 29.

5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3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39.

流傳更可能是不小的殺傷力。[6]

儘管如此，晚近以來柏林的歷史觀念仍然逐漸得到某些學者關注。格雷（John Gray）在其書《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第三章〈歷史〉內，[7]針對柏林的歷史觀念，提出較全面性的探討。格雷傾向從縱的時間長軸來定位柏林，亦即從啟蒙以來的前後思潮中尋找柏林的身影。格雷的研究重心在於比較柏林和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赫德（Herder, 1744~1803）、托爾斯泰（Tolstoy, 1828~1912）、啟蒙運動思想家、馬克思等這些人物之間的思想異同。帕克（Christopher Parker）在《英國 1850 年以來的歷史傳統》（*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中，以個人主義和全體主義兩個暗喻，作為分析英國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歷史思想發展的基準，而柏林被列為英國個人主義傳統的重要承繼者。[8]柯拉科福特（James Cracraft）認為值此後現代思潮對史學產生重大衝擊之際，反思柏林的學說，甚具啟發性。如柏林坦承史家無可自免於價值判斷，他之宣揚自由選擇和多樣化等價值，皆有振聾發聵的意義，能為一般實務性史家提供某種哲學的導引。柯拉科福特目光所及的是，柏林以哲學角度出發的歷史議論，並與現今思潮之間的關連性。[9]

本文專究柏林的歷史思想，探討他如何闡發「歷史」。柏林這方面的思索至一九五〇年代已然孕育成熟，形之於文。他在這些年中，縱論史學的發展趨勢以及史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種種問題。但限於篇幅，本文

---

6 英國後現代史家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指出，《歷史論集》出版三十餘年來，仍然在史學的課程和講演中得到學者的「強力推薦」，並且始終維持銷售熱潮。見凱斯．詹京斯著，江政寬譯，《後現代歷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7；Keith Jenkins,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1995), 2-3. Richard J. Evans 另也對卡耳其書縱橫史學界多年這點，有所分析：Richard J.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1-3. 理查．伊凡斯（Richard J. Evans）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臺北：巨流出版公司，2002），1~3。

7 John Gray, *Isaiah Berlin*, 76-97.

8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LTD, 1990), 40.

9 James Cracraft, "A Berlin For Historians," *History and Theory* 41 (October 2002, Middletown,

在此主要論證一九五〇年代時，柏林對「觀念史」這個領域的思考和期許，以及對西方近代史學和文化思潮的一些評述。吾人期望將柏林的歷史思想放入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學術發展脈絡中，進行審視與比較。或可說，本文更宏觀的企圖是藉由柏林，條理出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史學發展的一二軌跡。

以今日的眼光視之，柏林並非「正統」或「專業」的史家，他的「文化人」色彩甚至濃過「學者」的特質，就此而言，本文探究他歷史思想之價值與意義，有必要先行一提。這個問題或可從兩方面來考量：一方面，柏林雖非「正統」的史家，然他的的確確於一九五〇年代發表多篇論史性質的文章如：〈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歷史的必然性〉、〈刺蝟與狐狸〉（“Hedgehogs and Foxes”）、〈現實意識〉以及〈科學的歷史〉（“A Concept of Scientific History”）等等，而且柏林在高談歷史的字裡行間，皆以歷史學家的身分發言，毫無一絲勉強之意。此一現象其實緣自英國史學直至一九五〇年代為止，專業化發展猶未完全，使得「歷史領域」的開放性遠勝於今。因此，柏林的歷史思考並不致因為「專業性」不足而不值一哂。

另一方面，柏林確實和二十世紀中葉英國許多歷史、哲學學者多有往來，或是有間接聯繫。他和著名的歷史哲學家柯靈烏（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同屬牛津哲學圈中人，也和同樣鑽研歷史哲學的賈蒂納（Patrick Gardiner,1922~）時有往來，賈蒂納在其著作《歷史解釋的性質》（*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1952）前言中，特別向柏林的鼎力相助致謝。[10]另在一九三〇年代即發表《經驗及其模式》（*Experience and Its Modes*）一書的歐克秀特（Michael Oakeshott, 1901~1990），[11]曾於一九五三年前往聆聽柏林演講，而同場聽眾中還有《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Conn.), 277-300.

10 Patrick Gardiner,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1 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的作者巴伯（Karl Popper）。[12]又，柏林在文章中多次提及當代基督教派史家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他更和馬克思主義史家希爾（Christopher Hill, 1912~2003）以及著名歷史學者卡耳先後結為好友。這些學術網絡多少反映出柏林在當時英國學術界中的地位。因此，將他的歷史思想放在當代文化脈動中加以觀照，應具有重要的意義。

總而言之，本文擬將柏林的歷史思想視為一九五〇年代的文化現象之一，希冀透過此一文化現象，勾勒出冷戰初期英國史學發展和文化發展的更廣泛圖像。

# 二、柏林從哲學到觀念史之路

## （一）二十世紀初期牛津的學風

柏林出身巴爾幹半島拉脫維亞地區的猶太家庭。一九一〇年代，由於巴爾幹半島的動亂以及俄國大革命，使得柏林一家離開故鄉，輾轉遷往彼得格勒，並在柏林十歲時，定居英國倫敦。柏林的學術養成教育主要在牛津大學，他一生的教職生涯也都在牛津的芝切爾（Chichelle）學院和沃夫森（Wolfson）學院度過。

柏林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進入牛津時，主攻哲學，而且成績優異。但他最後何以捨「哲學」而就「觀念史」？關於這點，和柏林交情匪淺的美國思想史家懷德（Morton White）在《一個哲學家的故事》（*A Philosopher's Story*）這本書中，有所著墨。據懷德說，二次世界大戰前，柏林在牛津大學可說是一個正在崛起的、閃亮的哲學之星，是出色的哲學研究者奧斯丁（J. L. Austin, 1911~1960）、艾爾（A. J. Ayer, 1910~1989）的同輩。然而戰爭期間，柏林任職美國，並對自己從事哲學研究工作的能力產生了懷疑。這份懷疑因為數理邏輯家薛佛（H. M. Sheffer, 1883~

12 Karl Popper,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1964）的話而加深了。薛佛告訴他：若要從事真正的哲學研究，必須是數理邏輯家或科學心理學家背景，否則最好不要做此打算。柏林回到英國後，經過思慮，決定放棄哲學。懷德說，一九四九年春季他和柏林再度於哈佛見面，柏林此刻正在斯拉夫研究系所講授歷史課題，當時的他已經決定從哲學轉向觀念史，不過仍然十分留心英國哲學的發展。[13]懷德所記載的這段逸事，後來也為柏林傳記《他鄉：以撒．柏林傳》（*A Life: Isaiah Berlin*）的作者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所引述。[14]

根據懷德的考察，柏林轉向觀念史研究的關鍵是在一九四〇年代中期。不過，柏林其實在一九三六年時，已以觀念史的方式研究馬克思，並於一九三九年完成頗具學術價值的《馬克思傳》（*Karl Marx*）。[15]由此或可推論，柏林對於「觀念史」的興趣恐怕起始更早。只是從一九三〇年代遲至一九四〇年代末期，柏林的興趣才見明朗顯現，其中的延宕，令人玩味。而具有關鍵作用者，恐怕是當時牛津的哲學研究風尚。

柏林是在一九二八年秋天進入牛津聖體（Corpus）學院。他在晚年〈我的思想之路〉（“My Intellectual Path”）這篇演講稿中，回顧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牛津的學術氣氛。他提及當時同事之間最關注的是：「延續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哲學界一股逐漸回歸經驗主義潮流而來的議題。此一經驗主義的回歸主要是受了兩位著名的劍橋哲學家摩爾（G. E. Moore, 1873~ 1958）和羅素（Bertrand Russel, 1872~1970）的影響。」[16]在

13 Morton White, *A Philosopher's Stor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1-222.

14 柏林生平從未想過為自己立傳。他晚年時，倒接受了伊格納蒂夫的邀約。自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開始，伊格納蒂夫耗費十餘年時間，與柏林密切晤談，記錄柏林的口述回憶，並細心爬梳諸多尚未公開的書簡資料，終完成目前所見柏林最重要的傳記 *A Life: Isaiah Berlin*（1998），中譯：高毅、高煜譯，《他鄉：以撒．柏林傳》（以下簡稱《他鄉》）。伊格納蒂夫說，一九四四年初，柏林在哈佛教員俱樂部（Harvard Faculty Club）和數理邏輯家薛佛之間的相遇，促使柏林深思哲學研究的限制，使柏林萌生放棄哲學之意。一九四四年春天，柏林從美返回英國，下了飛機後，決定放棄哲學，走向觀念史。同時也向他所任教的新學院（New College）要求教授哲學史。見是書頁 196~197。

15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6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9),

這裡，柏林簡要點出了一九三〇年代哲學問題的重心，是承續自一次世界大戰前「經驗主義的回歸」。熟悉英國思想發展的人皆知，英國哲學相較於歐陸，向來具有濃厚經驗主義的色彩。這一獨特而長遠的傳統甚至影響英國各方面學術的發展。柏林對英國這一哲學傳承有以下的概述：

> 英國哲學普遍是一種由培根開始的經驗主義哲學。這種哲學從培根傳到霍布斯，又傳到洛克。洛克是經驗主義者，不是在宗教與倫理方面，而是在世界與自然認識方面的經驗主義者。之後又出現柏克來（Berkley）……對被稱為外部世界的看法上，他則是經驗主義者。休姆與穆勒（Mill）也是經驗主義者……。[17]

既然經驗主義由來已久，為何柏林會談及一九三〇年代牛津有「回歸」經驗主義之風？這就必須溯及十九世紀末迄二十世紀初哲學史的一段發展。

十九世紀下半葉，黑格爾哲學傳入英國，促成以康德和黑格爾為基礎的唯心論哲學的興起，此派學者尤以格林（Thomas Hill Green, 1836~1882）、布來德雷（Francis Herbert Bradley, 1846~1924）、波桑達（Bernard Bosanquet, 1848~1923）著名。比柏林稍早進入牛津的歷史哲學家柯靈烏，在他的《自傳》（*An Autobiography*）中即稱這個學派為「格林學派」（the School of Green）。[18]而除了英國之外，義大利同樣也有唯心論哲學的支脈。大體而言，這些哲學家的研究興趣偏向理解甚於建構。依這些學者之見，只有從「整體」的觀照角度始有可能真正理解某物。而且，在唯心論者的眼中，實在界就是思想，思想之外，並無他物。

唯心論在英國異軍突起，甚至柏林也坦承曾受其影響，他聲稱自己早年是「英國的黑格爾派」。[19]關於唯心論在英國哲學界的影響，柯靈烏

---

24-25.

17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Ramin Jahanbegloo）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思想的瀚海》（臺北：正中書局，1994，以下簡稱《以撒．柏林對話錄》），145。

18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6-17.

19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197。不過，柏林在晚年的《最初和最後》（*The First and The Last*）這本論集中，對於他和唯心論的關

和柏林這兩位先後的「牛津人」認知有些差距。同樣以回憶方式提到這個運動時，柯靈烏認為「就任何一方面的意義來說，（它）都未曾主宰過牛津的哲學思想與教學」，「因為格林學派未曾主導過牛津的教師，所以，儘管一九一〇年代牛津瀰漫著一股對它的敵意，卻不足以稱為對它的反動。」[20]柏林卻認為黑格爾哲學曾在英國佔有「主導地位」，[21]此所以他用「回歸」一詞，形容一九一〇年代以來牛津哲學回轉經驗主義的發展。

無論如何，唯心論哲學在英國這塊經驗主義的沃土上，的確生存不易，[22]早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羅素和摩爾已分別為文批駁唯心論。如一九〇三年摩爾發表〈批判唯心論〉（“The Refutation of Idealism”），針對唯心論代表人物布來德雷的思想進行批判。羅素和摩爾正是柏林口中所謂「回歸經驗主義」潮流的開山祖師，他們所引領的這股潮流即形成所謂的「實在論」（realism）。

「實在論」者是以古老的牛津學風為根基，並且因應唯心論，致力於探討：除了可感知經驗之外，是否存在著其他現實？「實在論」者認為外部世界是一種物質的現實，外部世界獨立於觀察者之外，如實存在，並可以被直接感覺到（當然也可能被曲解），而人對世界所產生的思想主要是透過命題——語言去表達。因此這類學者強調藉由日常生活的語

---

係說法與稍早時有些不同。他自述「我從來沒有相信過被稱為唯心論的……那種觀點」。見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31.

20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16-17. 柯靈烏在此似乎有意淡化唯心論的影響，帕克（Parker）認為，柯靈烏此舉或許是由於他不願承認自己和唯心論以及格林學派之間曾經有過深切的淵源。參見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Ideas of History from Coleridge to Collingwoood*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0), 161-162. 另參見奧康諾（D. J. O’Conner）著，洪漢鼎等譯，《批評的西方哲學史》（臺北：桂冠出版公司，1998），下冊，1244。

21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198。

22 例如布來德雷（Bradley）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學術聲望已經降低，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布來德雷的學說更成了眾矢之的。參見奧康諾著，洪漢鼎等譯，《批評的西方哲學史》，下冊，1144~1163。不過，柯靈烏反倒認為這個學派的沒落是來自內部的活力消失，無以為繼，而非受到奠基於英國經驗主義的「實在論」之衝擊所致。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17-18.

言分析，以測試命題的有無意義。從實在論者的觀點看來，所有的命題價值相等，因為世界之中並沒有所謂的「價值」，倫理學和美學的領域是偶有的、超驗的，所以不可能存在任何這類型的命題。

實在論可說是稟承英國經驗主義，加以推陳出新後的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哲學界中，實在論的影響深遠。不但柯靈烏曾接受過實在論的訓練，柏林也自承從黑格爾哲學派出走後，就成為實在論者。正因為英國經驗取向的思想模式根深蒂固，一九三〇年代末期，維也納學派（Vienna School）始能順利登陸英國，並發展出「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風潮。依柏林所述，「邏輯實證論」者最重要的主張就是檢證原則，他們相信命題的可證性（verification）乃是檢驗命題的基本標準。也就是說，陳述必須通過嚴密的驗證，否則只是不實際的、而且是無意義的事實。[23]

不過，邏輯實證論並未取代實在論的勢力。由於實在論者不同意邏輯實證論一派把科學語言視為所有語言典範的觀點，一九三〇年代末期又出現了一股結合英國經驗主義和探析日常語言用法的「牛津哲學運動」。這個運動以牛津年輕一代哲學家為主流，而柏林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柏林自述，一九三六年由他發起的一個特別小組討論會，討論會的聚會地點正是在他的寢室內。[24]

綜上所述，二次世界大戰前，經驗主義是牛津哲學的根本骨架，由此而轉化出的實在論、邏輯實證論以及牛津哲學運動，都注重語言學的研究和分析。可想而知，這樣的學術風氣下，自然不會重視從歷史脈絡研究觀念思想的路子。誠如柯靈烏的觀察，實在論者認為千古以來的哲學問題是不變的、永恆的，從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笛卡兒所問的問題皆同，只不過提出的答案相異罷了。此所以摩爾會說：整個西方哲學不過是柏拉圖哲學的注腳而已。秉持這樣的思考前提，實在論者認為哲學「史」是一門沒有哲學意義的課。「幾乎完全不談歷史」，[25]這是柯靈烏

23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26-27.

24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196~197。

25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84-85.

在牛津所發出的喟嘆。

## （二）觀念史研究的景況

依此看來，二十世紀以來的牛津哲學傳統實非孕育哲學史或觀念史研究的溫床，整個學術走向尤不利於從事歷史方法的探究。而任何人在此環境下試圖採用歷史的取向，必定吃力不討好，那是一條艱辛而孤寂的路。

事實上，當柏林還正積極參與甚至建構牛津哲學傳統時，柯靈烏已率先一步宣示哲學研究與歷史方法結合的重要性。柯靈烏曾表白：「歷史方法論久被完全忽視的事實（至少英國如此），使我鼓起勇氣想把注意力投注到歷史方法論上，希望藉此悟出一些知識中為『實在論者』所隱蔽的真理……。」[26]但是，在彼時牛津一片實在論籠罩的文化氣氛中，欲反其道而獨行，並不容易。作為一個反動者，柯靈烏的心境也許可從這一、二句話中隱隱識出：「我並不期望其他哲學家了解我」，「我終於發現我被歸類了。只是我也已經習慣了。」[27]吾人不難讀出這些豁達的話語之中，顯然又含有幾許無奈。無怪乎德瑞（William Dray）會認為，柯靈烏在《自傳》中是個「寂寞的思想者，他努力對抗外界的紛爭，只因在當時那樣一個專業環境中，人們冷漠的對待、甚至充滿敵意的看待柯靈烏這樣的想法：歷史可能會產生獨特的哲學問題。」[28]

柯靈烏的處境其實也是柏林後來的寫照。在〈我的學術之路〉這篇演講稿中，柏林對於自己如何走上觀念史研究這個問題，描述不多。他回憶一九三〇年代時，自己身為牛津哲學運動的一員，卻已對當時流行的現象論哲學有所懷疑，他總認為這種哲學不過奠定於虛幻不穩固的基

---

26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86. 柯靈烏在此主要著眼於歷史「方法」對於哲學研究的重要性。但他對「歷史」的看法曾有所變化。他在一九一五年的文章中，尚把歷史視同客觀的「事實」。見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Idea of History from Coleridge to Collingwood*, 171-172.

27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55-56.

28 William Dray, *History As Re-enactment: R.G. Collingwood's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

礎上。[29]柏林說：「雖然受到維也納學派以及他們所討論問題和學說的影響，我卻從來沒有真正成為它的信徒」，[30]「……我積極參與這些（實在論所關切問題）討論，……然而我始終是個異端，儘管還算是友善的異端。」[31]

柏林除了對牛津哲學的走向一開始就持著保留的態度之外，他也曾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慕名前去旁聽柯靈烏所開授的「歷史哲學」課程。為柏林作傳的伊格納蒂夫記述：

> 他還去聽柯靈烏的歷史哲學課。柯靈烏堅持用歷史方法研究哲學問題，在牛津哲學家中獨樹一幟。柏林後來對歷史哲學，如十八世紀那不勒斯人維科（Giambattista Vico）這類哲學先鋒，以及對自己逐漸形成的「認為歷史方法是研究哲學的最好方法」這一信念的興趣，如果說跟牛津有什麼淵源的話，那就是柯靈烏。[32]

除了柯靈烏的薰陶之外，另有一人對於柏林的「歷史」之路也有推動之功。一九三二年夏天，柏林通過畢業考試，獲得優等成績，同年十月便受推薦進入新學院（New College）擔任哲學教師，由是因緣際會地與一九二五年以來即任新學院院長的費雪（H. A. L. Fisher, 1865~1940）成為忘年至交。[33]費雪是自由主義派史家，他因《歐洲史》（*A History of Europe*）這本暢銷書而在英國大眾之間擁有極高的名望。在此書前言中，費雪倡言人類歷史的進展中沒有模式（pattern）可言，反倒充斥著偶然和不可預見的支配力量，他並斷言歐洲的問題「非出於經濟，是出在道德和政治上」。[34]費雪的觀點在當時知識分子間頗有影響力，[35]而柏林在一

29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32-33.

30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27.

31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28-29.

32 伊格納蒂夫著，高毅等譯，《他鄉》，85~86；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58.

33 伊格納蒂夫著，高毅等譯，《他鄉》，88；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59.

34 H. A. L. Fisher, *A History of Europ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35), vol. 1, vii. Christopher Parker, *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127.

35 如巴伯（Karl Popper）在其名著《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中引述費雪的觀點為證。見卡爾．巴伯著，李豐斌譯，《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90；

九五〇年代所發表的史觀和費雪的理念之間，也有相通之處。費雪當時擔任霍姆（Home）圖書館一套大眾化叢書的編輯，他在一九三三年邀請柏林為這套叢書撰寫一本有關馬克思的傳記。柏林正是藉此機緣，完成了他第一本思想史之作《馬克思傳》。

上述一二事例透露出柏林對於以歷史方法探究觀念的興趣早已萌芽。但是在時勢所趨之中，「逆流而行」需要相當大的勇氣，或因此柏林遲至一九四〇年代末期才正式宣告自己的學術意向。[36]爾後，柏林在《以撒．柏林對話錄》內追憶自己的學術之路時，如此坦承：

> 作為一個哲學家，我並不孤獨。在牛津任教時，我是一個哲學小組的成員，我們有共同的語言，談論同一個題目。我還是這一運動的踴躍參加者。……之後，我的興趣有所改變。觀念史在英國學術界並不時髦。事實上，我在知識份子中有些孤立。[37]

柯靈烏和柏林，一前一後，以歷史哲學和觀念史為志趣，然而在英國的學術長流中，孤寂似乎成了他們無可避免的共同經歷。觀念史研究不但在柯靈烏的時代，甚至下到二十世紀中葉柏林學思成熟時，仍無法獲得英國以及牛津學術圈的認同和共鳴。[38]不過，一九四〇年代和五〇年代之際，柏林畢竟明白展現自己的轉向。

---

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91), 109.

36 柏林走上觀念史的另一個可能因素是他在一九四五年的俄國之行。在俄國旅行的兩年時間內，柏林親炙許多受到俄國當局迫害的知識分子，尤其是當時受到俄共監控的女詩人安娜．艾克瑪托娃跌宕的人生苦難，燃起了他對俄國思想的研究熱情。柏林在俄國文化中找到了他從事觀念史研究的第一個著力點。參見伊格納蒂夫著，高毅等譯，《他鄉》，254~263。

37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117。

38 根據柏林的好友哲學家漢姆謝（Stuart Hampshire）的回憶，柏林在戰爭期間志趣轉向觀念史，此後他在牛津就變得頗為孤寂，因為當時牛津沒有觀念史研究的歷史學者，而他和過去哲學界的朋友也失去了可以聊天和論辯的知識話題，他的談話長才從此不再有發揮的舞台，最後只能倚賴偶爾前往美國排遣他的孤寂，那裡有一些研究生對思想史有興趣。見 Ved Mehta, *Fly and the Fly Bottle* (London: The Shenval Press, 1962), 75-76.

# 三、柏林論觀念史研究的價值與方法

## （一）觀念史與思辨玄學之別

一九三〇年代末，柏林奉派前往美國，先後在紐約新聞處以及華盛頓大使館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柏林返回英國，重新在牛津新學院擔任教職，直到一九五〇年才擺脫了繁重的教學工作，回到萬靈（All Souls）學院專事研究和寫作。也是在此時，柏林終於明確宣示他轉戰觀念史領域的決心，他的意念展現在一九五〇年《外交事務》（*The Foreign Affairs*）這本雜誌上他所發表的〈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一文。

依柏林自述，他撰寫〈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多少是出於對史達林統治下最後數年的蘇聯政權所行的政策之反感」。[39]而後世學者討論這篇文章時，也常著眼柏林如何闡說多樣性的價值、個人自由抉擇之重要等信念。[40]不過，柏林在文章之始開宗明義論述史學，這部分饒具意義，卻常為人忽略。細閱柏林個人的學術作品，此文第一部分「觀念史上的對比」，當是柏林經過長期的潛沉醞釀，決定跨入觀念史的重大一步，他更在這短短數頁之間表達了他對當前史學潮流的看法。

柏林首先點明觀念史研究的知識建構問題。他指出：「研究觀念史的學者，無論心中如何自覺到審慎與細心的必要性，畢竟不可避免要透過某種模式（pattern），來理解他們的史料。」[41]有趣的是，柏林馬上澄清，運用模式並不同等於黑格爾式的那種形上幻想（metaphysical fantasy），唯以追求凌駕一切的歷史「定律」（laws）為要旨。柏林說，模式為研

39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1，註釋 1；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5.

40 Airleen Kelly, “A Revolutionary Without Fanaticism,” in Roland Dworkin, Mark Lilla and Robert B. Silvers, eds.,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1), 7. 另外，伊格納蒂夫說這篇文章「可以作為一篇冷戰的文本、一篇自由主義者在蘇聯威脅面前捍衛自由的文章來讀」。見伊格納蒂夫著，高毅等譯，《他鄉》，302~303；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198.

41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1；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究過程之必要，歷史學者面對過去紛雜的史料和現象，必得運用模式、加以「解釋」。柏林論道：「『理解、對照、分類、排比』，以各種複雜程度或大或小的模式來研察事理，並不是什麼特殊的思考方式，這其實正是思考的本身。」[42]另一方面，柏林也提醒讀者，切莫以為世間必定存有某種自明的、不受人為解釋左右和安排的「單純事實」（bare facts），此種認定同屬謬誤之列。

柏林說明「事實」與「解釋」的依存關係，若就當代史學發展脈絡來看，實非新創的見解。距此十餘年前，柯靈烏已明白指出：歷史的「事實」和科學中此時此刻由感官直接經驗的「事實」不同；歷史事實是「依據一套規則與假設構成的複雜系統，經過解釋史料的過程，而後推定出來的結論。」[43]而與柏林大約同代的巴特菲爾德（H. Butterfield）更直接挑明，許多看似中立的記敘背後，其實都在運用歷史解釋，甚且歷史解釋經常染有國家和地域的色彩，[44]巴特菲爾德便以剖析存在英國史學傳統中根深蒂固的輝格史觀而揚名學界。與這些同輩相較，柏林的上述論點的確未出其右。但他真正意圖釐清的恐怕更應是「歷史解釋」和「建構超然定律」全然不同這點。柏林意在指出，史學研究固因詮釋所需，必得透過模態為個別孤立的事實定位，以安排事實之間的秩序，但是此一策略和建構形而上的指導歷史的原則卻是兩回事。柏林這一特意區別，看來似是劃清界線之舉，在當代背景中倒是有跡可尋。

十九世紀上半葉由黑格爾領軍的唯心論「歷史哲學」，歷經孔德、馬克思以不同方式接續發揚之後，十九世紀末曾經式微一時。[45]直至第一

---

55.

42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2；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6.

43 柯靈烏（R. G. Collingwood）著，陳明福譯，《歷史的理念》（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2），182；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33.

44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Englishmen and its Histo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4), 1.

45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黑格爾式歷史哲學的沒落之因，或與十九世紀民族意識的勃發、民族國家史學的興盛有關。此外，隨著史學日益走上專業化，大規模思考人類整體

次世界大戰前後，由於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和湯恩比（Arnold Tonybee, 1889~1975）的著作相繼問世，又再度引發一波鑽研的熱潮。然而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人們經常把希特勒的興起、蘇聯共產政權的發展等種種現象，歸於這類「歷史哲學」的貽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那些曾經試圖從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尋求未來希望的知識分子紛紛覺醒，轉而批判這類玄思哲學，斥之為「知識分子的鴉片」。[46]英國作家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作品即可說是戰後西方知識界那股厭惡抽象義理氣氛的最佳表徵。另在哲學方面，如愛丁堡大學的華雪（W. H. Walsh, 1913~1986），在他那本出版於一九五一年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將黑格爾式那種欲從整體人類歷史的演進中尋得終極意義和法則的思考，定型歸納並命名為「思辨歷史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以明確和探究歷史學科問題的「分析歷史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劃分開來。[47]這些發生在不同領域的反思風潮，很可能讓柏林在護衛觀念史研究進行詮釋工作的正當性之餘，深恐他的從事被誤認為黑格爾的玄學一流，因而鄭重提出申明。

乍看之下，柏林強調「模式」的建構出於安排事理所需，而形而上的玄學則意在追求終極的定律，兩者似只因「目的」不同而為異類。然而，柏林在三年後的另一篇文章〈歷史的必然性〉內，談及近期西方文化中某些人熱中追求「歷史模式」時卻說：「對這些人而言，發現重大

過去的探究取向被許多史家目為只純粹建立在想像而非實證的基礎上，恐亦為其不受重視之因。參見 Patrick Manning,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31; Mark T. Gilderhus, *History and Historians: A Histor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2000), 58.

46 取自 Raymond Aron 的書名：Raymond Aron,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Doubleday, 1957). 另見 Roland N. Stromberg, *After Everything: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194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6.

47 華雪（W. H. Walsh）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0），6~8；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84), 15-17.

的『模式』（pattern）、或規律（regularity）的觀念，自然非常具有吸引力……。」[48]對照柏林前後均用「模式」一詞，指涉卻大不相同，前者為說明觀念史探討所需，後者為抨擊當世西方思潮的主流，前後顯有矛盾和不一之處。柏林雖以研究目的不同隔開彼此，但觀念史家用來安排事實的「模式」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其形成過程與形上玄學有何差距？柏林的比較中顯然留下了未解之謎，同時也留下未來學者議論的空間。

二十餘年之後，新歷史主義者懷特（Hayden White）聲稱，歷史敘事都隱含虛構，也都具有解釋（explanation）的成分，但沒有哪種解釋比其他解釋更接近真實；歷史著作反映的是不同模式的解釋，敘事本身並不存在足以判定高低、真誤的標準。懷特舉例說，黑格爾、馬克思、湯恩比等所謂「思辨歷史哲學家」，經常被一些自詡為「正牌」的史家（proper historians）抨擊，他們的作品被貶抑為解釋勝過事實。然而懷特指出，從來就不曾有所謂「真確的歷史」（proper history），所有的歷史都內含形上意識，而且那是歷史呈現過程中必要的「詮釋策略」（interpretative strategies）。[49]

無可否認，二十世紀中葉一些歷史學者亟欲把思辨歷史哲學劃歸形上玄想的同類，俾與專業的歷史研究隔開，以便進行批判和自清。華雪使用「思辨」一詞，即是表明把這類思考取向視同「純哲學」、「先天主義」（a priorism）。[50]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至後現代主義者的手中，卻把柏林這輩學者建築出的分際全然抹平了。在懷特那後現代主義的探照燈下，觀念史「模式」和黑格爾代表的「思辨哲學」之間的差距未如柏林想像的那樣大，兩者實都預含「後設歷史」的成分。柏林的見識的確未臻於此，不過，他也非當代的特例。

48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26；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96.

49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Press Ltd., 1987), 51-52.

50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4、154；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4, 147.

## （二）歷史方法的必要性

柏林雖未能識出觀念史模式和形而上玄學其實具有某些共同的成分，他倒能深切體會所有知識和思想皆具「歷史性」（historicity）。柏林指出，歷史著作以及任何文化的產物，其所展現的意象和擬喻，常與時代的風潮或知識傾向契合。「在一部曾一度普受推崇的史學作品中，所顯示的社會、經濟、及政治概念與預設……對該一時代的一般特色所作的透露……」，才是值得注意的要點。換言之，在柏林的觀念中，史學作品所展現的解釋範型（models）乃依著各時代的興趣和背景而來，一部作品反映的是該時代的研究旨趣，因而史學作品存在的價值是「對該時代所採取的標準、所追詢的問題、『事實』與『詮釋』各自扮演的角色，更為可靠的指標。」[51]這意味著：研究者最應該「藉由人們看待過去（或現在、或未來）的方式有何改變，以及在慣用的成語與口號、懷疑與希望、恐懼與欣賞等方面有何變化……」，[52]來理解各時代的知識結晶。

柏林據此聲明：並沒有一套絕對的真理或嚴格的事實性標準，足以評斷古今中外的歷史學家。史學評論必須建構在時空架構內，那是「以特定社會、特定時期為準，於研究主題範圍內，在有關精確、客觀以及審慎的『忠於事實』方面，所能獲致的最精微的概念而已。」[53]所以，柏林指出，若指摘某個史家誇張、有偏見，這並非苛責他們不符合某種放諸四海皆準的鐵則，而是意指他們的研究和他們那個時代、地方以及社會「公認的檢證」和「詮釋典範」相去太遠。

柏林闡明歷史解釋無法離時代背景而論，各時代的問題意識既然不同，便絕難有一致適用的評比標準。他也由此確認：進行差異比較的「歷

51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8.

52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8.

5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3；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6.

史方法」之重要。柏林援自己的興趣為例，研究過去社會中「最典型人物的意識經驗（conscious experience）」時，「歷史方法是必需的：唯有透過與過去的對比及差異，我們所屬的時代經驗中一些獨具的特徵，才能在相關的背景上，充分浮現出來，使我們能給予適當的審查與描述。」[54]所以當柏林環顧歐洲近代智識的脈動時，即特意忽略不同時代之間互通而相似的觀念，而專注於二十世紀特有的政治觀點。他欲藉此找出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彼此之間的「共通的觀念」，以與二十世紀思想家做整體的對比。柏林宣稱：歷史的理解（historical understanding）唯有深入西方文化傳統中的斷裂和差異的交替過程，始能獲得。也可以說，柏林所謂的歷史方法，運用在大範圍的比較研究上時，就是一種化約或捨同求異的策略。

以上柏林從作品和思想的「歷史性」進而暢談他對觀念史領域的研究期待，他彷彿藉此公開明志：他將踵繼柯靈烏的步伐，將歷史引入觀念探索之中，以歷史比較方法研究各時代的觀念特質。然而，柏林的宣告中，尚有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如何考量社會情境與思想發展的關係，那些「最典型人物的意識經驗」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當代觀念史學者對此議題各有己見，因而在觀念史最盛行的美國學院中即衍生出兩種研究取向。

## （三）「觀念史」或「思想史」？

雖然牛津以及整個英國歷史、哲學界對觀念史的興趣缺缺，一海之隔的美國形勢卻大不相同。自二十世紀初，觀念史領域在美國文化圈中已然成形。尤其至一九三〇和一九四〇年代，當時激烈政治變動的背後往往和意識形態衝突有關，多少帶動學界探究觀念和思想的風氣。另外，西方知識發展到二十世紀，逐漸朝向支離化、專門化，而觀念史具有把各個部分串聯起來的作用，[55]此或也是觀念史研究得以在美國學術版圖中

54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8.

55 鮑墨（Franklin Baumer）著，李日章譯，《西方近代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逐漸佔得一席之位的背景之一。

然而，觀念史這個範疇從初始就有路線之別。一些學者側重於探究任何時代中某些觀念的演變和表現，認為抽象而獨立的觀念，會在現實過程中自主推進。這種研究取向一般稱為「觀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並且多以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美國哲學歷史家勒弗喬（A. O. Lovejoy, 1873~1962）為代表。[56]勒弗喬的成名之作是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存在的大鎖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他在這本書中，從複雜的教義和理論中尋找出某些普遍的「單位思想」（unit-ideas），進行縱深角度研究。勒弗喬和他的一些學生隨後在一九四〇年代創辦了自己的期刊《觀念史雜誌》（*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藉由這個刊物，勒弗喬建立了某種觀念史研究的典範模式。

另一種研究取向則從社會面解析心靈和思想的發展，學者多名之為「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此派在研究方法上重視思想與社會的互動，而不只措意於思想的內涵，也就是更注意思想的運用問題。但關於這一脈傳統的起源，各方說法不一，或推崇《新英格蘭思想》（*The New England Mind*）的作者米勒（Perry Miller, 1905~1963）的重要性，[57]或視研究十八世紀啟蒙思想而聲名大噪的史家貝克（Carl Becker, 1873~1945）

---

1988），5~6。

56 Stefan Collini,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Today* 35: 10(October 1985, London), 46-47.

57 米勒（Perry Miller）乃是一九三〇年代美國史學者，他重建了整個清教徒作家的思想體系，並著重於刻劃「生命概念」的相互關聯性。米勒的書打破了美國歷史起源的一元解釋，對建構美國歷史的傳統帶來甚大的衝擊。尊米勒為美國思想史開先河者，如 Roger Chartier, “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 The French Trajectories,” in Dominick LaCapra & Steven L. Kaplan eds.,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13. 另亦見吉伯特（Felix Gilbert），〈思想史之目標與方法〉，收入 Felix Gilbert & Stephen R. Grauband 合編，李豐斌譯，《當代史學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Today*）（臺北：明文出版社，1982），111~115。但是，也有學者認為米勒的研究方向仍然和勒弗喬的觀念史為同一個路線。如 Robert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0), 191.

為此一研究的濫觴。[58]也有學者上推精通十八世紀末革命史並且曾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布林頓（Crane Brinton, 1898~1968）為典範代表。[59]

一九三〇年代以降，有關各時代的心靈活動問題逐漸引發美國學界探究的熱潮，但在「觀念史」和「思想史」兩個詞義的界線上，學者的看法始終不一。[60]這當然顯示研究者對於探究人類心靈活動這個課題的切入角度以及理解的目的不易謀合。就某種意義來說，何謂「觀念史」和「思想史」，與何謂「歷史」，乃是一體兩面的問題。晚近以來，當歷史解釋逐漸看重社會力量的作用和時代因素的影響時，「觀念史」和「思想史」兩者間的消長自然日見分明，「思想史」較之「觀念史」被視為更接近「歷史」。之後再演變至今，甚至兩者都已無法獨立自存，而必須納入「社會史」或「文化史」的架構中，始見其意義。

但在二十世紀中葉，柏林決意踏上這條研究之路時，這兩個詞仍經常為人混用，兩者的分際似乎也不那麼鮮明，彼此之間尚有含混模糊、難以認定的地帶。如柏林雖然多稱自己的研究為「觀念史」，但也曾使用「思想史」一詞。[61]

柏林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0~1945）奉派任職美國，對於美國的學術趨勢應該有所了解，甚至熟悉。一九四九年時，他又應哈佛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之邀到美訪問和講學，且於此時結識了米勒。[62]從研究路線來看，柏林對於過去時代中特出人物的「意識經驗」興趣濃厚，毋寧近

58 Robert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194-195.

59 黃俊傑，〈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4 期（1977，臺北），358。

60 譬如一九八五年 *History Today* 這本雜誌規劃了一個專題論壇：「論何謂思想史」（On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集數位史家之力，重新反省觀念史或思想史在史學研究中的定位和意義。參見 *History Today* 35:10, 46-54. 其他討論另見 Annabel Brett,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David Cannadine ed., *What is History No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13-131.

61 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in Isaiah Berlin, ed. by Henry Hardy,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London: Chatto & Windus Limited, 1996), 27.

62 伊格納蒂夫著，高毅等譯《他鄉》，292；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191.

於勒弗喬或者米勒的「觀念史」一途。[63]

不過，柏林是否完全否定思想所在的社會力量？在〈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中，柏林曾對此加以說明。他提及，某個社會中人們所言所思產生的概念，可能是出於其他社會、心理或物理環境的影響，然這些成因的研究屬於經驗科學的工作。他坦言自己情有獨鍾的是一個時代或一個社會中，最具特色的個人的意識經驗、成就。往後，在《以撒．柏林對話錄》中，柏林也對訪者表示，年鑑史學派所鑽研的「心理」背景固然有其重要性，但他懷疑今人對於蘇格拉底時代的雅典、雅典的「心理」、雅典的生活方式所知能有多少？「我們只能片面的去研究為什麼它們（思想）會產生如此強大的影響力」，「儘管我們對產生這些思想的物質環境、歷史細節以及它們是如何傳播缺乏了解，但這些思想還是流傳下來了。」[64]這或可解釋柏林為何只願就思想本身的演變進行了解，他似因歷史建構過去圖像的困境，而對於這種社會心理的解釋敬謝不敏。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柏林未能見及：建構過去思想，與建構過去的社會脈絡，兩者同樣都有困難，也都無法避免文本對應真實的問題。

綜觀柏林之見，不同時代衡量意識經驗的「公認的檢證標準」不同，因而不可能存在一套全人類和所有文化適用的判斷指標，這樣的思考似乎是對每個時代的文化特色和所屬思想發展示以平等對待和寬大尊重。柏林在晚年的自述中把自己這一思想因子稱為「多元主義」（pluralism），而且歸功於維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和赫德的啟發。他在〈我的知識之路〉內，提到維科時說：

> 真正的知識是有關事情為何如此的知識，而不只是敘說事情是什麼的知識，我們越是鑽研這個道理，越會明白，荷馬時代的希臘人提出的問題是不同於羅馬人提出的問題的，羅馬提出的問題也不同於基督教中世紀或十七世紀的科學文化或維科自己的十八世紀時代的問題。問題不同，答案自然不同，使用的語言和象徵也不同。……文化相異，

63 Norman J. Wilson, *History in Crisis: Rec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ograph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9), 74.

64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33。

> 他們的觀點就不同。因此從來沒有一個普遍性的答案可以適用於不同人的問題。[65]

柏林介紹赫德的學說時，同樣強調：每種文化都有自身的參照點，「並沒有什麼普遍性的答案，可以對這個文化有效，又適用那個文化。」[66]由此可證，前後三十餘年間，柏林始終維持著一種多元主義的文化觀點。

格雷研究柏林的思想根源，也認為這一思想特質是來自柏林「歷史主義式的」人性論：「柏林拒斥啟蒙運動和輝格黨的歷史觀……他反對那種超歷史的全球性進步和退步的評價判斷……像赫德和黑格爾一樣，柏林也採歷史主義式（Historicist）的觀點來看待人性，也就是說，大多數人的善（與惡）是被歷史創造出來的……。」[67]格雷並且判定「柏林從人類本性的歷史主義觀點，建構他的價值多元的人類學理論。」[68]

柏林擷取赫德和維科所持的人性和文化的歷史主義觀點，從而堅守多元主義的價值，那麼在這多元文化的角度下，柏林如何看待過去與現在的變遷？維科和赫德儘管拒絕單一方向的進步主義，卻對於歷史的演進大抵表示樂觀。[69]赫德即認為：人類的進步不是一種「科學」，而是一種「努力」、一種成長，其展現的方式也是多元多樣的。[70]而同樣帶著歷史主義論調的黑格爾更堅信歷史能夠揭示意義，這種意義只能透過歷史顯現出來，進步的方向亦只能由歷史的脈動中加以掌握。那麼，柏林是否也認同進步的信念？關於這個問題，或可從柏林評論西方近代史學的演進中，獲得一些線索。

---

65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41.

66 Isaiah Berl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44.

67 John Gray, *Isaiah Berlin*, 83-84.

68 John Gray, *Isaiah Berlin*, 74-75.

69 伊格爾斯（Georg G. Iggers）著，周樑楷譯，〈歷史主義〉，收入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296。

70 Paul Hamilton,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96), 41.

# 四、柏林論近代史學變革的意義

## （一）史學的「浪漫式革命」

在〈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中，柏林直抒他對西方近百年史學發展的議論。他承認，近代以來在歷史解釋方面出現了重大的變化，可稱為「歷史寫作的浪漫式革命」。此一革命「將寫作的重點從『個人』的成就，轉移到極少個人色彩的『制度』之成長與影響上……。」[71]

柏林所謂「浪漫式」史學革命，應是相對於「理性」而來。他在這篇文章稍後，分析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各自的需求和目的時，指出這些主張共同認定「他們的時代充滿著社會與政治問題。但唯有自覺的運用那些所有天生睿智之士都會贊同的真理，才能解決這些問題。」[72]柏林說，上述假定是「極為理性主義式的。……但整個浪漫主義運動都隱含地否定了這些假定……。」此外，柏林還提到：「過去的反動派與浪漫主義者，雖然大力主張制度性的權威和神諭，要比個人的理智，擁有更高的智慧……。」[73]以上這些段落差可顯示柏林口中「理性史學」與「浪漫史學」之別，在於看待歷史時側重的是少數個人的理智作用，抑或群體的、制度性的力量形塑。

柏林這裡的區分重點以及他對浪漫史學的評價，顯然和一些史家的觀點出入頗大。某些史家提及「浪漫史學」時，總是強調其對「個體性」和「獨特性」的尊崇，是對於啟蒙理性史學講究一切訴諸理性那種僵化和機械觀點的一種挑戰。[74]但柏林看重的是歷史解釋如何由個人理智，轉

71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3；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6.

72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86；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66.

7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1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88.

74 Michael Bentley, “Introduction: Approaches to Modernity: Western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in Michael Bentley ed., *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7), 412.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London: The

而強調外在制度或力量。甚且，柏林所謂「浪漫式革命」在時間上非只限於十九世紀初期，而是涵蓋十九世紀後整個西方史學的演進，同時還包含了科學派史家。如他提到有些：「……『科學的』史學家們批評編年史家的『傳奇故事』，他們的譴責至少有一部分是暗指早期歷史作者的作品，與後來最受景仰及信任的科學發現之間，有所謂的牴觸現象存在……。」[75]

當然，我們不難看出柏林盱衡浪漫史學的演進，其中否定的成分多於積極迎接。他也曾明白表示，過去的希臘羅馬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c*.460- *c*.400 B.C.）和塔西徒斯（Tacitus, *c*.56-*c*.117），或十八世紀的伏爾泰（Voltaire, 1694~ 1778），相較於新史學派的代表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薩維翁（F. Carl. von Savign, 1779~1861），或米敘列（Jules Michelete, 1798~1874）等人，並未顯得更加主觀、含混或虛妄。在他眼中，新與舊之間，未必前者為優，而後者為劣，前者並非較後者進步，不過是各時代側重的角度不同而已。

平心而論，柏林聲稱十九世紀以來的新史學普遍注重外在的力量，而輕忽個人理智的作用，這種見解不免有過於簡化之嫌。柏林口中的新史學派代表蘭克和米敘列在史學風格上其實大異其趣，前者偏向政治和檔案的研究，後者以文化與民俗歷史見長，而薩維翁則是著名的日耳曼法律史學者。他們都被柏林一概歸類為十九世紀「浪漫革命」的代表，在他的天平上，他們同樣都循著國家、法律、眾人生活習俗等「個人理性」以外的角度來探究歷史的發展。在這些同個世紀的人物之間，柏林無疑應用的是「捨異求同」的歷史比較法，因而得出這樣的概論。

無論如何，柏林最急於昭告的是，經歷過革命後的這些史學家及其著作，其「忠於事實」的程度不必然高於過去，史學典範的轉移並未代表了進步。他的觀點可由以下這段話充分展現出來：

> 新史學也者，不過是從如今所謂不同的「角度」寫成的著作而已。新史學所要記載的事實與從前的不同，所要強調的重點也不同，既然對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40-250.

75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74；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 問題的旨趣有所轉變，當然所使用的方法也就隨之改觀。新史學的概念與術語，反應了史學家們對何者可以構成證據一事，在觀點上已經改變，到頭來連對何謂「事實」，便有了與不同以往的觀點。[76]

上述之見顯然是立足於一個與進步論相反的基石上。儘管柏林承認西方十九世紀迄二十世紀發生了史學上的變遷，但他在「多元觀念」的前提下，否認這一變革具有任何進步意義，同時也貶抑如蘭克於西方近代史學上的重要性。以柏林所處時代來看，此一解釋角度頗為特出；尤其在反對「進步觀」這點上，柏林和二十世紀中葉許多史家的看法大相逕庭，其中包括他的兩位至交好友。

## （二）近代史學是斷裂或進步？

試看一九四七年知名的考古學家柴爾德（Gordon Childe, 1892~1957）出版一本小書：《什麼是歷史》（*What is History?*）（和一九六〇年卡耳那本享譽學界的書同名），其中他說道：「歷史是針對過去所有留下的資料進行的科學研究，歷史將會成為不斷進步的科學（a science of progress）……歷史應該揭示某種秩序。」[77]柴爾德在期許歷史可能的發展之餘，堅信史學是一門進步之學。

再如一九三〇年代柏林在牛津的好友、也是馬克思派史家希爾（Christopher Hill），於一九四八年發表〈馬克思主義與歷史〉（“Marxism and History”）一文。希爾在這篇比柏林〈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出版時間稍早的文章內指稱：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中葉，史學歷經重大的進展和革命，這些進展包括現代史學不再從個人的好壞賢愚解釋歷史，轉而考慮社會階級背景；強調意識的社會起源，且注重經濟史的重要性等。[78]希爾把這一切視為馬克思主義直接和間接的促成，並且認定近百年來的

---

57.

76 以撒. 柏林著, 陳曉林譯,《自由四論》, 73~74；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57.

77 V. Gordon Childe,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3), 3.

78 Christopher Hill, “Marxism and History,” in John Tosh, ed., *Historians on History*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0), 84-86.

史學持續在前進之中。

此外，一九五五年時，史家巴特菲爾德出版《人類論往事：探究歷史學的歷史》（*Man On His Pas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從此書名不難得知作者在這部作品中的宏觀要旨，他欲縱觀近代西方史學的源流與發展。巴特菲爾德贊同十九世紀確實有場「知識革命」之說，這個革命是由德國領先群倫，繼而影響十九世紀末英國重要的史家如艾克頓（Lord Acton, 1834~1902）。雖然巴特菲爾德認為這場革命是緩進的、是大大小小許多德國史家共同的心血創作，他仍高聲讚揚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7）和蘭克是開啟歷史研究革命的關鍵人物，而蘭克更是十九世紀史學的第一人。[79]簡言之，巴特菲爾德同樣是以進步眼光賦予十九世紀史學意義。

而於一九四〇至一九五〇年代和柏林感情甚篤的史家卡耳，亦在一九六〇年問世的《歷史論集》中宣揚「進步」的信念。他說：「今天的歷史家較之百年前的歷史家，在科學的領域裡，更有自信的理由」，[80]「……對這些問題，一九二〇年代的歷史家較之一八八〇年代的歷史家更接近客觀的批評，而今天的歷史家較之一九二〇年代的歷史家又更接近客觀批評；下一個世紀的歷史家或許又會更接近一些。」[81]卡耳甚至意有所指：

> 懷疑論者或許會說，新解釋並不見得比舊解釋更真，……然而，從事經濟和社會目的的研究較之從事憲法和政治目的的研究，既然代表人類發展上一個更廣泛、更前進的階段，那麼我可以說，經濟和社會的解釋比憲法和政治的歷史解釋也更代表歷史上更前進的階段……歷史是一門進步的學問，一為它對事件的過程（這過程本身

79 Herbert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22, 28.

80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50；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51.

81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120；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124. 關於歷史學是否具有累進的性質，伊凡斯認為歷史學的知識的確是累進的。見理查．伊凡斯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57~58；Richard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40-42.

就是進步的）提供不斷擴展而又深入的認識。」[82]

在這些話語中，滿溢的是卡耳對於自身所處時代的歷史學已超越前人成就的樂觀自信。[83]

上述幾位學者其治學方法和理念不盡相同，但都是一九五〇年代英國史學界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之士，他們於環顧近一、兩個世紀的史學演進時，率皆以「進步」、「革命」的角度端視，而且讚許歷史是一門通往進步的學科。此一看法在史學史論著中頗得支持，幾乎蔚成主流觀點。[84]雖然談及催生這一變革的主力，學者之見莫衷一是，或歸諸馬克思之功，或尊蘭克為始祖。如柴爾德在其書中把馬克思思想奉為西方近代史學發展的顛峰，希爾更逕視西方史學變革盡為馬克思主義的締造。卡耳在《歷史論集》中雖未直接說明立場，但他多次於字裡行間稱許馬克思並摘引其言，[85]顯見對馬克思也頗有崇敬之意。相較之下，卡耳對蘭克貶意甚明。他在書中僅有兩次正式提及蘭克，語氣都屬負面，視蘭克為

82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114~115；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118.

83 對卡耳進步信念的批評，可參考理查．伊凡斯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264~269；Richard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194-198.

84 在西方史學論著中也有對此表示質疑和持保留態度者，如 Georg Iggers。Georg Iggers 說：這種號稱新型態的史學和舊式歷史學之間未必是全然的斷裂，兩者之間仍有一脈相續之處，都認為歷史的進程是連續的、有方向的，他們都認為事實上存在著一種歷史（a history）這種東西，它與多樣性的歷史完全不同。Iggers 並指出，蘭克代表的是德國的史學模式，注重歷史與國家政治目的的連結。但蘭克之外，同時期的法國也有許多出色的史家，如米敘列，他們的史學取向偏向大眾和文化史，更具有公共歷史的特色。他認為十九世紀末，史學重心逐漸傾向蘭克史學派，各國相繼仿效德國的職業化史學路線，就某方面來說，也就意味著史學的狹窄化，「從比較廣泛的文化史倒退到了更加狹隘的集中研究政治的歷史學」。對於這樣的發展，Iggers 的惋惜勝過欣喜。伊格爾斯（Georg Iggers）著，楊豫譯，《二十世紀的史學》（臺北：昭明出版社，2003），5；Geor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1997), 4.

85 例如，卡耳在抨擊那種把歷史事件的發展委之於人以外力量的觀點時，說道：在這個問題上「我將毫無保留的接受馬克思的話」，他並隨即援引馬克思的一段話為證。另如卡耳談到歷史應該追求一般化，而一般化並非指構建一套歷史體系這個問題時，竟話鋒一轉，對馬克思遭人誤解有意構造歷史體系這件事，甚感不平。參見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41~42、57~58；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43-44, 58-59.

十九世紀「迷信事實」的表徵。[86]當然，這三位都與馬克思學派的淵源或深或淺。另一方面，基督教派史家巴特菲爾德傳承英國科學治史傳統，尊蘭克和德國史學為近代史學的先河，此一觀點並在一九七〇年後有馬威克（Arthur Marwick）延續發揚。馬威克大力推舉蘭克，以其和尼布爾、法國的米敘列齊名，譽此三人是十九世紀史學革命的推手。[87]

儘管在論及近代史學革命的推動力上，英國史家的看法分歧，但都共同肯定十九世紀迄二十世紀的史學變革是為進步的發展，然而柏林的思考卻與此背道而馳。柏林認為十九至二十世紀的史學遞變雖可說是一種斷裂，但不可稱此一發展以及蘭克的史學或馬克思主義即謂進步。這些變遷不過就是反映十九世紀時，人們追求的問題、所看重的事與過去不同，以至於在有關「證據」以及如何使用「證據」等方面，和前人的做法有別。按柏林之見，若要說彼時「新史學」別有新意的話，那就是解釋歷史時不再強調「人」的重要性，轉而強調「社會環境」的因素；捨棄從人的理智理解歷史，而歸諸理智以外的制度環境。近期史學發展的意義盡皆在此。於是乎，在柏林的評價中，馬克思或蘭克並無任何值得鑄記的劃時代貢獻。展讀柏林之見，這番逆流而行的思考，或可預示柏林和希爾以及卡耳這兩位曾經相交甚篤的史家，終究不免因道不同而必須分道揚鑣。[88]

---

86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3、13；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3, 13. 在這裡，卡耳顯然認定蘭克為實證主義者。巴特菲爾德曾經慨嘆英國人誤解蘭克甚深，以為蘭克只重事實、沒有思想，不關注廣泛和普遍性。卡耳似乎正是巴特菲爾德所抨擊對蘭克懷有偏見的學者之一。見 Herbert Butterfield, *Man on His Past*, 104。此外，蘭克的形象在十九世紀以來的美國和日爾曼的史學界歷時而不同，蘭克史學的歷史意義亦與時變化。參見 Georg Iggers, "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 *History and Theory*, 2 (1962), 17-40. 另外，臺灣近代以來的歷史學界對於蘭克史學的詮釋方向也歷經改變，這部分可參考蘇世杰，〈歷史敘述中的蘭克印象——蘭克與臺灣史學發展〉，《當代》163 期（2001，臺北），48~77。

87 Arthur Marwick, *The Nature of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70), 34.

88 柏林和這兩位史家都曾經有過深厚交情，後來卻都因為理念不合而日見疏遠。一九三〇年代的牛津大學馬克思主義一時盛行，柏林曾經參與自由主義者的俱樂部，而和希爾相熟，柏林撰寫《馬克思傳》時，希爾還遠從莫斯科寄資料援助柏林寫作。一九四七年後，

柏林以多元觀念為基礎，堅持改變並非進步，各時代有其獨特的提問和相應的答案，無法以同一套標準衡量。然而，這一思考走向有否可能掉入相對主義的暗巷中？畢竟，歷史主義和相對主義僅有一步之隔。當一切的知識和文化表現都被視為歷史的產物，是否就意味著價值和倫理上的虛無化？這也正是二十世紀歷史主義面臨的最大危機和最深的反省。[89]如柏林所言，每個時代的思想創造都有其獨特背景，則該如何評論這些價值？或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價值標準？柏林如何在其間思量定奪？

事實上，柏林並未跨入相對主義的深淵。[90]他在否認近代西方史學的「進步」價值中，實不難探出他的批判意味。柏林欲以多元主義抗衡西方近代思潮的絕對正當性，他在〈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中儘管盡力維持平衡、公允的語氣，論述之間仍不能掩蓋他的褒貶和取捨。不過，就在不到兩年的時間之後，意即一九五三年時的〈歷史的必然性〉這篇文章內，柏林一反保守含蓄，已然理直氣壯表露自己的立場。他掄起批判和裁決之筆，以「決定論」指斥黑格爾、馬克思等西方思想家之謬，護衛個人意志和自由存在歷史中、現實中之實。

---

兩人因為對布爾什維克黨的觀點歧異而漸行漸遠。參見伊格納蒂夫著，高毅等譯，《他鄉》，103~104、266~267。Michael Ignatieff, *A Life: Isaiah Berlin*, 70, 174-175。卡耳和柏林則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相熟，至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卡耳旅居牛津，兩人往來密切，但一九五五年之後，隨著卡耳遷往劍橋，兩人史觀的差異也日益明顯，終至於一九六〇年代，兩人為了史學問題互打筆戰。

89 一九二二年，Ernst Trosltsch 發表〈歷史主義的危機〉，被視為歷史主義發展到極致後的最深刻反省。見鮑墨著，李日章譯，《西方近代思想史》，600~603；伊格爾斯著，楊豫譯，《二十世紀的史學》，43。

90 Thomas Nagel 認為，柏林「不是一個價值上的歷史主義者，依我來看，他真正是一個道德上的現實主義者（moral realist）。他的多元主義所以顯得特別而且有趣，應如 Ronald Dworkin 所說，那是一種現實主義式的多元主義，而不是相對主義式的多元主義。柏林堅持一點：他深信價值之間的確存在著真正的、永恆的衝突。」Nagel 力辯柏林非一般所認定的「歷史主義」者，他同時也不能被列入相對主義的陣營中。Thomas Nagel, “Pluralism and Coherence,” in Ronald Dworkin, Mark Lilla and Robert B. Silvers, eds.,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105。John Gray 同樣有此看法，參見其書 *Isaiah Berlin*, 62-72。

# 五、柏林批判「決定論」

## （一）決定論思想的根源

一九五〇年代，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初期，人們對於希特勒的極權組織記憶猶新，一股厭棄抽象、追求具體的保守氣氛因此瀰漫在這些年代之中。相對的，這也是一個「……能清楚的看到意識型態的力量正在衰微……」的時期。[91]從英國著名的政治史家納米爾（Lewis Namier, 1888~1960）在一九五五年觀察時局而寫下的一段話，更可嗅出一九五〇年代的氛圍。

> 有些政治學家抱怨，今天的英國有種「疲乏後的平靜」，對一般的政治缺乏爭論，對實際問題兩黨雖然都在追求具體的解決，卻忘記了全盤的計劃和理想。可是在我看來，這種態度倒是一個大國成熟的表現，而且我還希望這種態度能長久繼續下去，不受政治哲學的介入所困擾。[92]

然而不應忽略的是，在人們對抽象哲理的興趣日益消退之際，另一面的表現則是對西方十九世紀以來形而上哲學的一波波批判和駁斥。

環顧一九五〇年代的英國學界，批判黑格爾、馬克思之聲，確實時有所聞，學者分從不同的角度，直指「歷史哲學」的弊端。前已提及的華雪（W. H. Walsh）於一九五一年撰寫《歷史哲學》一書，正是此時代風潮的映照。

華雪把他所謂「思辨歷史哲學」的獨立研究之始歸諸赫德和黑格爾，其後，歷史哲學「就其傳統形式而言，並沒有隨黑格爾偕亡。馬克思曾以不同的方式來繼承黑格爾的衣缽，而近代學者史賓格勒和湯恩比等又相繼在研究。」[93]華雪承認這脈思辨歷史哲學有「間接性的貢獻」，那就

91 華特金士（Frederick M. Watkins）、克拉姆尼克（Issac Kramnick）著，張明貴譯，《意識型態的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119。

92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31~32；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33.

93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6；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5.

是：「……引起一般人對十八世紀末還盛行的那些散漫年鑑和空虛說教發生反感，從此刺激了十九世紀歷史研究的大步邁進，複雜而富有批判精神的歷史學亦自此開始。」[94]但緊接著，華雪以大量篇幅指斥：「思辨歷史哲學家……的工作是騙人的，因為他們似乎只在玩弄一套抽象邏輯的把戲——這些邏輯思考在其固有範圍內是否正確已成問題，更不必說可以應用到歷史上了。」[95]

有趣的是，華雪在書中對眾思辨歷史哲學家的批評語多嚴厲，不假辭色，唯獨對馬克思的態度例外。譬如，華雪斥責「康德的理論表面上似乎很複雜和微妙，可是在歷史家看來卻完全是武斷而無根據」。[96]至於孔德的「……體系與其說是科學的，毋寧說是『形上的』，……它的建立完全是為了適應孔德個人的偏見。」[97]提到當代的史家湯恩比時，華雪更是語帶蔑視：「五十年後還會有人讀《歷史研究》一書麼？由於這部書充塞著許多湯恩比自己的……意見和偏見，再加上後半部是如此草率從事，我很懷疑會有許多人去讀它」，「……他那豐富想像力的優點蓋不住他那雜亂理解力的缺點」。反觀作者對馬克思的評述頗為委婉，似乎有所顧忌：「……用他（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他的理論和其他類似的理論……不同，是因為它具有科學的基礎。這……的確值得哲學家研究，因為馬克思所謂的『科學基礎』其正確性如何，並不太明顯。」[98]

華雪對自己的這種差別對待其實有所交代。他坦承「現在知道孔德的名字的人或許不會太多，但『馬克思』一名則不免會引起強烈的反應。

94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156；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49.

95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152；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45.

96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131；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28.

97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161；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53.

98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166~167；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58.

不僅贊成和反對的陣線使我們對馬克思的學理不能做一個公正的評估……。」[99]華雪道出了現實中擁護和敵視馬克思主義的兩方人馬相互對峙和環伺下，欲給予馬克思一個客觀的公允之論，實為不可承受的重。

華雪所感受到的壓力其實正間接反映出，二次大戰後的英國，儘管批判馬克思主義之風正熾，但並不意味著這股思想力量隨之衰退。耐人尋味的，一九四六至一九五六年之間正是英國馬克思歷史學派傳統的形成時期，[100]這段期間內，「共產黨史家小組」（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在當時學界中頗為活躍，其成員包括和柏林相熟的希爾，以及後來知名的馬克思派史家朵布（Maurice Dobb, 1900~1976）、霍布斯邦（E. Hobsbawm）、湯普森（E. P. Thompson），這些學者均致力於將馬克思的理論與歷史研究相結合。而一九五二年創刊的《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雜誌，更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亟思和非馬克思歷史研究圈子交流而建起的一座溝通之橋。這些現象都可視為是馬克思思想在英國學界中蓄勢待發的指標。就此來看，一九五〇年代英國知識分子批判馬克思之風，應不只是出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局的檢視和反省心態，恐怕還包含著對於當今馬克思主義勢力擴張的一種憂心。柏林在一九五三年寫下〈歷史的必然性〉，應也是具有醒世憂時的自許意味。

〈歷史的必然性〉這篇文章是柏林於一九五三年應倫敦政經學院之邀、以紀念孔德貢獻為名發表講演的改寫文。在許多學者眼中，這是一篇抨擊決定論和護衛個人自由意志的力作。和柏林同時代的荷蘭史家蓋伊勒（Pieter Geyl, 1887~1966），於一九五五年總論這篇文章旨在證明決定論用於歷史解釋上的虛謬。而且，蓋伊勒語氣委婉的說，「柏林先生的心時時刻刻被決定論的問題佔滿，他的解答漫漫散見他的論述之中。」言下之意，柏林的論證鬆散不夠精確（或與此文脫胎自演講稿有關），[101]

99 華雪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162；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154.

100 Har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Oxford: Polity Press, 1984), 10.

101 柏林的寫作通常帶有演講式的、自由揮灑的風格，很少見其如一般學術論文羅列引文和

蓋伊勒因此還盡力釐清並整理出他個人所見三個重點：決定論為什麼錯誤？這種錯誤的危機何在？以決定論解釋人類事務，可能導致的具體結果為何？[102]其實，更簡要地說，柏林這篇文章的結構大略分為兩部分：前半部處理決定論的思想特色和根源，後半部著墨的是決定論對史學概念方面的影響。

柏林首先點出十九世紀以來，「在歷史哲學家之間，甚至在歷史學家之間，盛行著一種回復到古老觀點的傾向，認為從一個『客觀的』角度來看，凡是現有的事物，都是最好的事物。」[103]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認為歷史受到某些超越力量的主宰和支配，「這些巨大的實體或力量，所指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它們的功能又如何？關於這個問題，每一位理論家的看法，都不一樣。隨便舉個例子來說，如：種族、膚色、教會、國家、階級、氣候、灌溉方式、工業技術、地緣狀況、文明、社會結構、人類精神、集體潛意識（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等，都可能是。」[104]柏林指出，在這種思想的趨向下，人類的演進被視為是這些力量的體現，因而可以從中識得規律與法則。於是，「在歷史事件的推演過程中，發現重大的『模式』（pattern）或『規律』（regularity）……」是這些人汲汲於歷史中追求的目的。

柏林統稱這些看法為「決定論」（determinism），他並進而挖掘這種思考的根源。據他考察，決定論思想一則出於古老的形上學，其中最主要的成分是目的論因子（teleological）：「這種觀點自有人類思想以來，就已存在。它可以衍生出許多形式，但皆具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即是：人類以及所有生物，甚至包括無生物在內，都不僅祇是表面所呈現出來的那種東西而已；萬物都具有「功能」（functions），會追求「目的」

---

證據。參見 Stefan Collini, *English Pasts :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3), 197.

102 Pieter Geyl, *Debates with Historians* (Meridian Books, 1955), 264-271.

103 以撒. 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24；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94.

104 以撒. 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52；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14.

（purposes）。」[105]在目的論者的觀念中，世界的發展朝著某個方向進行，且受到固定的「法則」所支配。這方向與法則，在某種程度上，可被那些使用正確研究方法的人發現。此外，柏林也看出一些古老的形上觀念，如「表象」和「實在」的二分法，對西方哲學中決定論的廣布亦有推波助瀾之功。

除了源出古代，柏林認為近代以來自然科學的盛行更使決定論思考如虎添翼。決定論者往往援「科學的」方法為名，去無限延伸歷史知識：他們先聲稱擁有對事實的確定知識，或大抵是確定的知識，然後，以某種形上系統或經驗系統為武裝，從這種知識的島嶼出發，去填補過去歷史的空隙，有時，武裝甚至填補屬於未來的無限空隙。[106]柏林之意，決定論者借用了「科學」和「客觀」兩大護法，藉以鞏固自身的知識權威。

以上柏林深入西方傳統內核，考察黑格爾、馬克思、史賓格勒以及湯恩比這些歷史哲學家論說的來龍去脈，並彰顯他們思想的公分母——決定論——在西方文化中的原初基礎。也許，就某個角度而言，柏林對決定論的診斷似乎比起華雪評述「思辨歷史哲學」來得「深入」幾分。蓋華雪的討論重在刻劃思辨歷史哲學的純粹「形上」思考，和「實務」（working）歷史學家的思考之間如何扞格不入、難以相容，且他多半將此脈哲學理論之不當，諉諸黑格爾、孔德、湯恩比等「個人」的武斷或「偏見」。而柏林則跳脫個人之責，敞開視窗，從西方文化的古今傳承中找尋「決定論」的源頭。但是，值得注意的，柏林的處理方式卻正顯現出他的自我矛盾：他思考決定論的癥結，並非追究黑格爾、馬克思等「個人」的責任（這反倒是華雪所依循之路），而是推及西方久遠的「傳統」。看來柏林在觀念史的論述上，似也無可避免地落入他自己的批判之中——捨棄個人責任、尋求更廣泛的解釋因素。[107]

---

105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37；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04.

106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43~14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08-109.

107 Sidney Morgenbesser 和 Jonathan Lieberson 也看到柏林此一自我矛盾的問題。他們指出：柏林批判一般的歷史解釋，總是陷入法則和趨勢的牢籠內，無以自拔；但是柏林討論維

再就訴諸人以外的力量這點來看，柏林僅就起源和思想特質解說「決定論」，[108]他似乎無意於進一步從現實變動的因素中，去察知這一脈思想的消長。亦即柏林並未道出，何以二十世紀以來，這類型的思考能夠擄獲許多人心之因。反觀同時期的史家崔弗羅伯（Hugh Trevor-Roper）談及此現象時，則是扣緊在時代脈動的分析上。

崔弗羅伯推論馬克思學說盛行的直接原因，乃出於大眾對「歷史哲學」的渴求。崔弗羅伯說，十九世紀的古典史學由於過度重視史料，導致這門學問日益窄化專門，知道的史料越多，了解的過去越少，於是乎歷史專業無法滿足一般人對理解現實問題的需要，人們最後只得轉求歷史哲學，企望從中覓得普遍的意義。此外，崔弗羅伯更強調一九四五年以來，西方發生普遍的文明「危機」，人們再無法天真抱持十九世紀自滿自得的進步史觀，在人心普遍徬徨的情勢下，能夠指引變遷之義的史賓格勒、湯恩比、馬克思等現代歷史先知，因此應時而出。[109]

從上述對比中，已可顯示柏林對觀念史的研究，重在探尋思想內在的脈絡和彼此的斷續。譬如他爾後在一九六〇年時撰寫的〈浪漫主義革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場危機〉（“The Romantic Revolution”）中，也是從抵制浪漫主義太過強調個人的主觀和意志這樣的角度，賦予黑格爾和馬克思思想意義。[110]也就是說，柏林側重觀念之間的流變，卻無意觸碰思想的社會起源。無論如何，正本清源只是柏林處理決定論的部分關注，他念茲在茲的更該是揭示決定論思想之弊。

---

科等思想家時，似乎也在提供一些「普遍的」歷史圖像，也進行著一般的歷史解釋。見 Sidney Morgenbesser and Jonathan Lieberson, “Isaiah Berlin,” in Alan Ryan ed., *The Idea of Freedom: Essays in Honour of Isaiah Berl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29-30.

108 不過，蓋伊勒認為柏林在分析決定論思考的根源上，忽略了宗教因素，尤其是聖奧古斯丁及其《上帝之城》對於決定論的影響不容忽視。見 Pieter Geyl, *Debates with Historians*, 266.

109 H. R. Trevor-Roper, *Historical Essay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285-287.

110 以撒．柏林，〈浪漫主義革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場危機〉，見以撒．柏林著，彭淮棟譯，《現實意識》，252~253；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in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The Sense of Reality*, 189-190.

## （二）決定論否定個人的抉擇自由

柏林所以反對決定論者，最大的理由正在於其完全否定了個人自由選擇的可能性。柏林認為無論任何形式的決定論，「這些看法所共有的一項特徵是：終極說來，個人作抉擇的自由，只是一個幻覺；相信人類可做另一種選擇，只是昧於事實的想法。」[111]決定論者把歷史演進的方向和目的委之於社會、形勢的力量，或形而上的、超然的原因，則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必然隱而不見。在柏林看來，決定論者把人類的演進，視為「更大實體」（large entities）的推動，[112]如此一方面可說卸除了個人行為的影響與責任，一方面卻也削減了個人自由抉擇的空間和意義。柏林說，這是以否定「道德困境」的存在為手段，藉此達到擺脫「道德困境」以及「道德抉擇」之責的企圖。[113]

柏林議論的軸心是個人抉擇的自由，這是柏林據以對抗決定論的中心支柱。對柏林而言，此一信念不是理論假設，而是來自經驗可及的事實。他指出，我們無法否認，人類有些時候的確是做了選擇，「而且他們的選擇不能完全以物理學或生物學上所接受的那種因果解釋，予以說明。」[114]不過，有關個人自由選擇這部分的演繹在〈歷史的必然性〉中並不多見，或因這篇文章旨在批判而不在建構，在破而非立。直待數年後，柏林撰寫〈兩種自由觀念〉（“Two Concept of Liberty”）時，才有較為明晰的詮說。

為什麼柏林如此堅持個人抉擇的自由，甚至畢生無悔？在〈兩種自由觀念〉中，柏林說明了人類面對選擇以及進行選擇的必要。他洞悉人世間各種價值彼此經常無法相容，甚至互相衝突，因此，在這些理想之

111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46；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10.

112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53；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15.

11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7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31.

114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63~164；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22-123.

間作出艱難的抉擇，本是人類境遇中所無可避免的一項特徵：

> 我們日常所經驗到的世界，是一個使我必須在同樣「終極」的目的、和同樣「絕對」的需求中，有所抉擇的世界，而在這些目的和需求中，某一部份的實現，也必然會使其他部份遭受犧牲。其實，人類所以如此重視「選擇的自由」的價值，也正因為人類處在這樣的情況中……。[115]

或可揣想，柏林歷經二十世紀以來，西方傳統價值觀的崩毀，以及一九三〇年代各種意識形態對立衝突的現實，因而從中深切體認到，並不是所有的「善」都可以相容貫通，職是之故，唯有「多元主義」才是最能符合實際和人性的一種主張。然而，柏林發現到，「從柏拉圖以降，直到黑格爾及馬克思的最後門徒為止」，卻不斷向世人宣稱「必定有一最終的和諧狀態存在，使所有的暗謎都得到解答，使一切的矛盾，都得以化解。」[116]柏林駁斥這些形而上的決定論昧於事實，違反了人類日常的經驗和知識。深察柏林的這番立論，他的多元主義是奠基於某種道德上的實在論（realism），[117]此一思維依稀可見牛津哲學所屬的實在論遺緒。由此亦可證明，柏林並未墮入相對主義或懷疑論的深淵，他以此堅持，佇立於歷史必然論的洪流之中。

綜上所言，柏林力辯決定論思潮，繫於他對個人自由選擇的確信。他深諳人類日常生活中多元並存的事實，據此反對決定論者強求「一致性」並以一套完美的社會規劃君臨天下。在他看來，「一元論」以及對於唯一標準的信仰，無論是來自十八世紀哲士對於烏托邦社會的憧憬，或來自德國歷史定論主義（historicism）的論說，最終都必然會面臨不符其實的窘境，因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從來不可預見。而令柏林更為憂心的是，決定論者為了削足適履，以野蠻行為強力達至原初理想，終必帶給

115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289~290；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213-214.

116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289；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213.

117 John Gray, *Isaiah Berlin*, 62-63.

社會嚴重的傷害。[118]

瀏覽柏林在一九五八年〈兩種自由觀念〉時說的話，不能不令人想起甫於前一年出版《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的思想家巴伯（Karl Popper）。巴伯在這本書中對歷史定論主義者同樣提出抨擊，指出他們預測人類歷史發展的理論邏輯，脆弱而難以成立。此即他和柏林兩人的見解常被援以相比的由來。[119]不可否認，柏林和巴伯的確都可列為一九五〇年代學界中，所興起的一股抵拒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的趨勢之一環，然而這兩位哲學家的出發點其實並不相同，對於決定論或歷史定論主義的評價也頗有差距。

巴伯批判的論據在於歷史的發展受到知識成長的影響很大，[120]因此無法以任何定論預知未來。柏林則由多元主義入手，聲討一元化的理論不但未切實際，且更壓制個人抉擇的自由。巴伯對於歷史定論主義的謬誤攻伐凌厲，但他承認，此一論說並非全無可取之處。例如談及歷史解釋這個議題時，他嘉許歷史定論主義是對某種幼稚的政治史解釋的制衡，那種政治史只是述說大暴君和大將軍的故事，太過看重偉人和領導者如亞歷山大、拿破崙的分量。但是，歷史定論主義者捨個人而訴諸時代、國家或其他形式的精神力量，在巴伯看來，無疑是誤入歧途之舉；他以為應該加強的是社會制度、社會運動等屬於社會學（sociology）工作方面的分析。[121]在這點上，巴伯和柏林的歧異立時顯現。

柏林譴責決定論者最切的正是他們放棄了追究亞歷山大、希特勒等歷史人物應負之責，讓個人有脫逃責任的口實，[122]此正是他三番兩次抨

118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293；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216.

119 Stefan Collini, *English Pas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207; Ian Harris, "Berlin and his Critics," in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253.

120 卡耳．巴伯著，李豐斌譯，《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vii-viii；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vi-vii.

121 卡耳．巴伯著，李豐斌譯，《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123~125；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148-149.

122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54~155；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擊近代史學中「非個人解釋」流風日長之因。柏林先在〈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內，提及十九世紀以來歷史解釋的變革，從忽略個人成就，到偏重制度性力量的影響。隨後在〈歷史的必然性〉中，柏林又再次歸納當今流行的歷史理論，可區分為「個人的」（personal）以及「非個人的」（impersonal）二種，採「個人」解釋取向的歷史學家探尋個人的意向及其作用；而「非個人」的歷史解釋否定動機的重要性，認為人類的行為多半起於非人所能控制的原因，如物理因素、環境或習俗的影響，或如種族、國家等更大單位的「自然」推力。[123]柏林早先以「浪漫史學」和「理性史學」之別，說明史學的演變，如今則代之以意義更加鮮明的「個人」和「非個人」解釋以為區分，此在在顯示柏林愈益想要凸顯個人是歷史前進不可或缺的因素，個人相對的必須對歷史負責。柏林遺憾的是，即使史學傳統內也難以抵禦「決定論」思想的滲透，而逐漸輕忽個人，反去標舉超個人的法則或實體。在柏林看來，西方近代文化發展中的最大思想貽害，莫甚於此。

### （三）個人意志或社會因素？

柏林和巴伯、決定論者的思想對立中，觸及歷史解釋上的一個重要議題，此即「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歷史解釋應該關注的是個人或者社會因素？

其實，今日來看，歷史的發展究竟是出於個人自由意志，或者更多是源於社會和時代力量的驅動，這個問題應已不再構成歷史理論的爭執核心，史學家多半採取較為中庸立場強調兩者的相互作用，甚至許多史家更堅信，只有從歷史人物身處的文化範疇中才能真正了解該歷史人物。但是從十九世紀迄一九六〇年代社會史勃興為止，如同柏林的觀察，是一段從個人的史觀轉向社會史觀的過渡期，於是，個人意志抑或社會力量不免在此段時期成為史學解釋角力所在。

---

*Liberty*, 115-117.

12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27~128；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97-98.

就強調個人意志力量的熱切來看，柏林在當世中倒非踽踽獨行者。例如和柏林同為猶太裔的納米爾（Lewis Namier），一樣傾向個人造就歷史說。納米爾認為：「歷史基本上是、而且越來越是由人的心志和性格塑造而成。」不過，納米爾對「個人」的剖析倒比傳統史學的定義更為寬廣：「人的心志並非都在運用理智（rationality），雖然理智曾經被珍視為心志的最高貴特質。」[124]也就是說，納米爾儘管偏向個人承載歷史的演進之責，但個人的行為並不都出於理智的思慮，更可能是受到非理性動機的驅使，而非理性（irrational）並不必然等同於不合理（unreasonable）。

相對於納米爾，卡耳則和巴伯立足於另一端。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卡耳堅稱，將個人天才視為歷史的創造力，這類看法只能行於單純的文化中，卻不能適用於較複雜的社會內；個人必然受到社會力量和歷史環境的約制，因此「無論從哪個意義來看，歷史都是一種社會的過程，在這過程裡，個人的身分是社會動物，至於社會和個人間那想像的對峙，僅足以混亂我們的視聽。歷史家和事實間的相互關係……不是抽象和孤立個人之間的對話，而是今天的社會和昨天的社會對話。」[125]

上述引文見諸卡耳《歷史論集》第二章「社會與個人」，其實從此篇名便不難感受到卡耳視社會力量超乎個人意志的堅持。無怪乎，卡耳在文中點名抨擊柏林〈歷史的必然性〉，認為柏林只注意個人素質和行為，此種歷史解釋屬於落伍的「惡王約翰式的歷史觀」（Bad King John Theory of History）。[126]

只是，卡耳的貶謫是否全盤合理？毫無疑問，在上述個人和社會的兩極拉力之間，柏林傾向前者，但究竟柏林看待個人行動的自主性達至何種程度？在卡耳和當代史家伊凡斯（Richard Evans）眼中，柏林徹底

124 Lewis Nami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6), 384.

125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4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49.

126 愛德華．卡耳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37；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39.

主張「個人是獨立自主的、是生來就具備不受束縛的自由意志……。」[127]因此是屬於絕對的個人意志論者。然而早在一九五〇年，柏林討論觀念史時，便已承認個人意識多少受到某些社會力量的影響，另外，〈歷史的必然性〉中也有立場相同的一段話：

> 這樣的看法，又隱含了對「個人責任」的信仰，至少，在某一個程度上是如此。至於「可能性的範圍」（the realm of possibility）有多大，可供自由選擇的途徑有多少，這就要看個人對「自然」與「歷史」作如何的解釋而定，但是，這種可能性的範圍及自由選擇的途徑，卻不可能完全沒有。然而，在我看來，那些沉溺於形上的、或科學的「決定論」中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們，所否認的卻正是這些東西。[128]

上述話語恐怕要讓卡耳和伊凡斯對柏林的評估有再商榷之必要。柏林清楚表明，個人自由的權限有多大這個問題，是有討論的空間，端賴論者如何劃定「自然」和「歷史」的範圍。譬如世代的傳承或社會的思想氣候對個人抉擇過程中的影響，究竟應劃歸自然因素或歷史因素？在一九五八年發表的〈兩種自由概念〉中，柏林也做此申明：

> 最終人類總要在諸多終極價值之間加以選擇；他們照他們的方式去選擇，因為他們的生活與思想，取決於基本的道德範疇與概念，這些範疇與概念，至少是歷經長久的時空而來，不論其起源為何，早已是他們的存有與思想，以及他們認同感的一部份，同時，也正是他們所以為人的部份因素。[129]

顯然柏林並非天真以為，個人完全可以「自主」抉擇，個人選擇行為是在歷史形成的價值背景，和複雜的意義網絡中進行，所以柏林抱持的不

127 理查．伊凡斯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151；Richard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111.

128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58；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19.

129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294；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17.

是自然主義式的個人自由，而是歷史主義式的個人自由。[130]柏林從未否定影響思想的物理和社會力量的存在，只不過他念茲在茲的是，盡力凸顯個人意識的作用和自由抉擇，以因應決定論的謬誤。由此來看，斷言柏林贊同「個人是獨立自主的、是生來就具備不受束縛」，恐為誇大或曲解之論。[131]

批判決定論乃是柏林在二十世紀中葉論史的重心，此一要素更可說貫穿了柏林全部的學術思考。甚至在一九八三年《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雜誌刊登的一篇柏林受訪紀錄中，柏林的強調一如他在一九五〇年代所提出的基本論說：價值理念無法相容、個人抉擇的必要、相信唯一真理存在的危險等。[132]

當然，柏林的關注有其一貫性，但也不應忽略他的思想有其細微的變化歷程。一九五〇年時，柏林只以「多元主義」為憑藉，闡明各種思想趨勢皆有其時代背景，新走向的歷史解釋未必比舊的歷史解釋進步高明，他藉此試圖解消新的史學潮流的正當氣勢。證諸〈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中，柏林雖不能苟同近世以來壓抑「個人自由選擇」的趨向，仍然語氣平和，諄諄教誨世人：「少一些救世主般的熱情，多一些開明的懷疑主義，多一些對個人怪癖的容忍、多一些有彈性的措施……不必那麼機械死板、那麼狂熱激情地使用所謂普遍性的原則，……『尤其不要過度熱衷』……。」[133]

---

130 John Gray, *Isaiah Berlin*, 72-73.

131 卡耳的《歷史論集》和伊凡斯《為史學辯護》都同樣以「社會與個人」為章節標題，顯見他們更強調社會作用。或因此一立場導致兩人看待柏林時，不免有誇大柏林對於個人選擇自由範圍之嫌。柏林在一九六五年為《自由四論》出版所寫的「導言」中即特意聲明，他並不認為自由選擇的範圍很廣，相反的，「自由的疆界遠比那些人所想像的狹窄的多」。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34；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28. 事實上，卡耳的立場前後也有所改變。據伊凡斯的分析，在《歷史論集》寫後數年，卡耳承認個人在歷史中地位較諸他以往所想還要來的重要。參見理查．伊凡斯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216~217；Richard Evans, *In Defense of History*, 161-162.

132 Enrique Kiauze 訪問，蔡英文譯，〈自由主義的挫敗與自由主義的義蘊——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伊撒柏麟訪問錄〉，《幼獅月刊》63:1（總 397 期）（1986，臺北），67~72。

133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120~121；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然而約隔三年，柏林在〈歷史的必然性〉中態度轉趨強硬，直接挑戰新歷史解釋的思考本質，譴責決定論者訴諸非個人力量、蔑視個人抉擇自由之不當。柏林在前一篇文章中，猶強調沒有絕對客觀的標準作為度量每個時代的思想成就，但下至〈歷史的必然性〉的扉頁之間，他的臧否褒貶，一無顧忌。再者，柏林早年曾是黑格爾學派，至撰寫〈二十世紀的政治理念〉時，他暢談觀念史之中，已刻意與黑格爾劃清界線，再至〈歷史的必然性〉，柏林挾「決定論」全面抨擊黑格爾、馬克思、湯恩比等思想家。柏林的思想歷程隱隱可見。

## 六、結語

縱觀柏林的史論，可能碰到的一個問題是：很難將柏林的思考歸於某個流派或某一思想傳統。他對於研究過往人物觀念意識的執著，似乎有著西方文化中重視理智的色彩；他的多元主義受到如赫德和維科等德國歷史主義哲學家的啟發；他對於日常生活中價值多樣化、價值衝突難以協調的堅持，既有實在論的影子，又彷如他是自己筆下那造成西方理性主義危機的浪漫主義者。[134]柏林思想這種「難以歸類」的特質，使得本文無意於西方文化長河中尋找他的歸屬和定位，而著重他與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學術文化的關係。當然，這樣的研究角度——探討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多重關係，其實與柏林看待歷史人物以及對於「觀念史」的思考取向是有所背離的。

論者譏諷柏林一生為數可觀的著述中，雖然書寫和創作的時機不一、形式上討論的問題也相異，但柏林在這些文字中自始至終彈著同一個主調，決不歷時而變，那就是拒斥「天真的企求統一和調和，而犧牲

*Liberty*, 92.

134 以撒．柏林，〈浪漫主義革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場危機〉，見以撒．柏林著，彭淮棟譯，《現實意識》，227~257；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in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The Sense of Reality*, 168-193.

經驗」的論點。[135]此一評價不能說毫無道理，畢竟柏林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的確維持著他始終如一的關注，從未改其護衛個人自由選擇的意念。但嚴格來看，這樣的評論也不盡符應柏林在一九五〇年代思想的演變歷程，尤其可能窄化柏林思想的內涵及其歷史意義。儘管柏林論史有其限制，他的論述中仍然涵蓋了不少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學術文化圈中的重要論題，他猶如一個可以窺知當時一些時代徵候和現象的窗口。

探究柏林的思想之路，首先照見的是觀念史研究在英國歷史學界中的困境。柏林認定觀念史處理的是過去之人的獨特意識經驗和結晶，正呈現他循著勒弗喬這派「觀念史」的腳步而來。他持著多元主義的原則，不認同十九世紀史學的變革具有進步意義，和當時許多史家的看法悖反而行。他質疑非個人解釋的力量日漸膨脹，惋惜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和責任受到漠視和壓抑，是對二十世紀以來，社會科學以及社會史興起的擷頏。而在一九五〇年代批判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形上哲學風尚中，柏林更以決定論之名強力回應此時代風潮。

柏林的史論既是那個時代和文化普遍趨勢的映照，有時卻也是一抹反射。藉由他的思想，可以尋繹一九五〇年代英國歷史與文化發展的一些概況。

（責任編輯：翁稷安　校對：楊月惠　邱士杰）

135 Stefan Collini, *English Pas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203.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
以撒．柏林著，彭淮棟譯，《俄國思想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以撒．柏林、雷敏．亞罕拜格魯（Ramin Jahanbegloo）著，楊孝明譯，《以撒．柏林對話錄：思想的瀚海》。臺北：正中書局，1994。
以撒．柏林著，馮克利譯，《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以撒．柏林著，胡傳勝譯，《自由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
以撒．柏林著，彭淮棟譯，《現實意識》。臺北：臉譜出版社，2004。
卡爾．巴伯（Karl Popper）著，李豐斌譯，《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
伊格爾斯（Georg Iggers）著，楊豫譯，《二十世紀的史學》。臺北：昭明出版社，2003。
柯靈烏（R. G. Collingwood）著，陳明福譯，《歷史的理念》。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2。
理查．伊凡斯（Richard J. Evans）著，潘振泰譯，《為史學辯護》。臺北：巨流出版公司，2002。
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著，江政寬譯，《後現代歷史學》。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華特金士（Frederick M. Watkins）、克拉姆尼克（Issac Kramnick）著，張明貴譯，《意識型態的時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
華雪（W. H. Walsh）著，王任光譯，《歷史哲學》。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0。
奧康諾（D. J. O’ Conner）著，洪漢鼎等譯，《批評的西方哲學史》。臺北：桂冠出版社，1998。
愛德華．卡耳（E. H. Carr）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1968〕。
鮑墨（Franklin Baumer）著，李日章譯，《西方近代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邁克．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著，高毅、高煜譯，《他鄉：以撒．柏林傳》。臺北：立緒文化，2001。
Aron, Raymond.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Doubleday, 1957.
Berlin, Isaiah. *Karl Marx.*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Berlin, Isaiah. *The First and The Last.*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9.
Breisach, Ernst.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Butterfield, Herbert. *The Englishmen and its Histor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4.
Butterfield, Herbert. *Man on His Pas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5.

Carr, E. H. *What is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61.

Childe, V. Gordon.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3.

Collingwood, R. G. *The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Collingwood, R. G.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Collini, Stefan. *English Pasts : 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3.

Darnton, Robert.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0.

Dray, William. *History As Re-enactment: R. G. Collingwood's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vans, Richard J. *In Defense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Fisher, H. A. L. *A History of Europ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35, vol. 1.

Gardiner, Patrick.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Geyl, Pieter. *Debates with Historians.* Meridian Books, 1955.

Gilderhus, Mark T. *History and Historians: A Histor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0.

Gray, John. *Isaiah Berli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Hamilton, Paul.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96.

Iggers, Georg.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1997.

Ignatieff, Michael. *A Life: Isaiah Berlin*, London: Vintage, 2000.

Jenkins, Keith. *On "What is History?" 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 London: Routledge, 1995.

Kaye, Harvey J.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Oxford: Polity Press, 1984.

Manning, Patrick. *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an Create a Global P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Marwick, Arthur. *The Nature of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70.

Mehta, Ved. *Fly and the Fly Bottle.* London: The Shenval Press, 1962.

Oakeshott, Michael.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Parker, Christopher. *The English Historical Tradition Since 1850.* Edinburgh: John Donald Publishers LTD, 1990.

Parker, Christopher. *The English Ideas of History from Coleridge to Collingwood.*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0.

Popper, Karl.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91.

Popper, Karl.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Stromberg, Roland N. *After Everything: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194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Trevor-Roper, H. R. *Historical Essay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Walsh, W. 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84.

White, Hayden. *Tropics of Discourse.*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Press Ltd., 1987.

White, Morton. *A Philosopher's Stor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Wilson, Norman J. *History in Crisis: Rec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ograph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9.

## 二、論文

伊格爾斯（Georg Iggers）著，周樑楷譯，〈歷史主義〉，收入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吉伯特（Felix Gilbert），〈思想史之目標與方法〉，收入 Felix Gilbert & Stephen R. Grauband 合編，李豐斌譯，《當代史學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Today*）。臺北：明文出版社，1982。

余桂霖，〈伊賽．柏林的政治學與理論〉，《復興崗學報》50，1993，臺北。

李振坤，〈柏林自由理論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程春益，〈以撒．柏林著「兩種自由概念」介述〉，《萬國法律》74，1994，臺北。

黃俊傑，〈思想史方法論的兩個側面〉，《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4 期，1977，臺北。

蘇文流，〈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政治學報》13，1985，臺北。

蘇世杰，〈歷史敘述中的蘭克印象——蘭克與台灣史學發展〉，《當代》163 期，2001，臺北。

Enrique Kiauze 訪問，蔡英文譯，〈自由主義的挫敗與自由主義的義蘊——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伊撒柏麟訪問錄〉，《幼獅月刊》63：1，1986，臺北。

Bentley, Michael. “Introduction: Approaches to Modernity: Western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in Michael Bentley ed., *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7.

Berlin, Isaiah,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in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London: Chatto & Windus Limited, 1996.

Brett, Annabel.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David Cannadine ed., *What is History No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Chartier, Roger. “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 The French Trajectories,” in Dominick LaCapra & Steven L. Kaplan eds.,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Collini, Stefan.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Today* 35:10, 1985, London.

Cracraft, James. “A Berlin For Historians,” *History and Theory* 41, October 2002, Middletown, Conn..

Harris, Ian. “Berlin and his Critics,” in Isaiah Berlin, edited by Henry Hardy,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Hill, Christopher. “Marxism and History,” in John Tosh, ed., *Historians on History.*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0.

Iggers, Georg. “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 *History and Theory* 2, 1962.

Kelly, Airleen. “A Revolutionary Without Fanaticism,” in Roland Dworkin, Mark Lilla and Robert B. Silvers, eds.,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1.

Morgenbesser, Sidney and Jonathan Lieberson, “Isaiah Berlin,” in Alan Ryan ed., *The Idea of Freedom: Essays in Honour of Isaiah Berl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Nagel, Thomas. “Pluralism and Coherence,” in Ronald Dworkin, Mark Lilla and Robert B. Silvers, eds.,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New York: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1.

Namier, Lewis. “Histo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6.

# Isaiah Berlin on History:
## From the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Ideas to the Critique of Determinism

Lin, Tzu-shu*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nquire into the historical view of Isaiah Berlin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historiography, and to relate his ideas to the work of his contemporaries.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it is hoped that some lights can be shed on 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England in the 1950s.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Berlin's comments o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d his concern over the influences of determinism. The reconstruction of Berlin's thought reveals the research dilemmas facing Oxford academic circles, the dominance of the progressive view of historiography shared by many historians while rejected by Berlin, and the growing ascendanc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Marxism.

**Keywords:** Isaiah Berlin, history of ideas, historiography, determinism.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